



全本·集释·全校

日知錄

集释

「清」顾炎武 著 黄汝成 集释
栾保群 吕宗力 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全本·集释·全校

日知錄

集释

上

「清」顾炎武 著 黄汝成 集释
栾保群 吕宗力 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知录集释/(清)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
校点.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6
ISBN 978-7-5325-7294-6

I. ①日… II. ①顾…②黄…③栾…④吕… III. ①文史哲—
中国—清代②《日知录》—注释 IV. ①B24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0585 号

日知录集释

(全二册)

[清]顾炎武 著 黄汝成 集释

栾保群 吕宗力 校点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常熟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9×1194 1/20 印张 41.8 插页 4 字数 677,000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

ISBN 978-7-5325-7294-6

I·2829 定价: 8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从《日知录》到《日知录集释》

(代前言)

陈祖武

《日知录》是清初著名学者和思想家顾炎武的代表作品，也是十七世纪中叶我国知识界一部足以反映时代风貌的学术巨著。这部书不仅在当时激起强烈共鸣，而且影响所及绵亘有清一代。乾嘉间朴学发皇，治《日知录》几成专学。道光初，黄汝成集诸家研究之大成，纂为《日知录集释》，为《日知录》研究做了一个承上启下的总结。从《日知录》到《日知录集释》，不啻百餘年间学术演进的一个缩影，留下了甚多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一、为学与为人相统一的一生

《日知录》的著者顾炎武，原名绛，字忠清，明亡，改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入。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一六八二），享年七十岁。炎武一生将为学与为人合为一体，操志高洁，学博识精，成为开启一代学术先路的杰出大师。

顾氏为江东望族，炎武高曾祖辈世为明廷仁宦，至其父辈，家道中落。时值明末，朱氏王朝经济崩溃，政治腐朽，犹如痼疽积年，只待溃烂。社会的危机，家境的窘迫，逐渐孕发炎武为学以救世的思想。自明崇祯十二年（一六三九）起，炎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天下郡国利病书序》），本“士当求实学”（顾炎武：《亭林余集》不分卷，《三朝纪事阙文序》）的家训，断然挣脱科举制度的束缚，倾全力于《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的纂辑。从此，专意搜集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及地理沿革诸方面的材料，试图据以探寻国贫民弱的根源所在，揭开了一生为学的新篇章。

崇祯十七年四月，明亡消息传到江南。五月，南明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炎武获授兵部司务之职。为应弘光政权征召，炎武撰成著名的“乙酉四论”，即《军制论》、《形勢论》、《田功论》、《钱法论》。从划江立国的实际出发，针对农田、钱法、军制诸方面的积弊，炎武提出了若干解救危难的应急措施。顺治二年（一六四五）五月，炎武取道镇江，前往南京赴任。未及到职，弘光政权已告覆灭。目睹清军的野蛮屠戮，炎武在苏州从军抗清。兵败，昆山、常熟相继失守，炎武嗣母绝食身亡，二弟死于非命，生母虽幸免一死，但已成终生残疾。

山河破碎，家难频仍。顾炎武寄心事于笔端，写下了许多饱含爱国激情的诗篇。他

从《日知录》到《日知录集释》（代前言）

以衔木填海的精卫自况，发出了“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顾炎武：《亭林诗集》卷一，《精卫》）的呐喊。此后五年间，炎武蓄发明志，一直潜踪息影，辗转于太湖沿岸，与各地抗清志士秘密往来。后为豪绅叶方恒加害，于顺治七年被迫剃发。十二年，再落叶氏圈套，以勾结海上抗清武装的罪名而入狱。出狱后，炎武决意远离故土，到久已眷念的中原大地去。

顺治十四年秋，炎武将家产尽行变卖，只身北去，时年四十五岁。北游之初，炎武频繁往来于山东、河北，一度南还江浙。顺治十八年，郑成功率部退往台湾，僻处西南一隅的南明永历政权灭亡。眼看复明大势已去，炎武断然拔足西走，决心“笃志经史”（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著述事业。

自康熙元年（一六六二）起，顾炎武把游踪扩至河南、山西、陕西。这以后，炎武除陆续撰写大量的诗文杂著外，全部精力几乎都用于《日知录》的写作。康熙二年，庄廷鑑私撰《明史》案发，炎武挚友潘怪章、吴炎蒙难。噩耗传来，炎武万分悲痛，于山西汾州旅邸遥为祭奠，以歌当哭，高唱：“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顾炎武：《亭林诗集》卷四，《汾州祭吴炎潘怪章二节士》）同时，还以《书吴潘二子事》为题，撰文详记二友死难始末，以表彰二人节操。炎武因憎恶明末的讲学风气，终身不登讲坛，不纳弟子。但为表示对潘怪章的纪念，破例将怪章弟来收为弟子。

康熙五年，山东莱州“逆诗”案发。七年二月，炎武因之在济南入狱。后幸有在翰林院供职的外甥徐元文斡旋，又得友人李因笃等竭力营救，始于同年十月取保出狱。莱州诗狱了结后，炎武一如既往，以友人所赠二马二骡装驮书卷，攀山越岭，不辞辛劳，为著述事业而进行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实地考察。

晚年的顾炎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以其深湛的学术造诣而名著朝野。然而不与清廷合作的志愿，则坚如盘石，朝廷显宦几度礼聘，皆为炎武断然拒绝。康熙十年，翰林院掌院学士熊赐履邀炎武预修《明史》，炎武直言相告：“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顾炎武：《蒋山佣残稿》卷二，《记与孝感熊先生语》）十七年，清廷诏举博学鸿儒，内外大吏皆欲以炎武列名荐牍。炎武郑重声明：“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宣告：“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三，《与叶切庵书》）为表示决心，炎武选定陕西华阴为终身客居地，从此不再进入北京。

康熙二十年八月，顾炎武旅居山西曲沃，不幸染疾。翌年正月初八日，溘然长逝。

顾炎武一生，“身涉万里，名满天下”（归庄：《归庄集》卷五，《与顾宁人书》），以“行奇学博，负海内重望”（钮琇：《觚觚》卷六，《蒋山佣》）。他广泛涉足于经学、史学、方志、舆地、音韵文字、金石考古以及诗文等学，在众多学术领域，皆有卓越建树。炎武著述繁富，“卷帙之积，几于等身”（王弘撰：《山志》卷三，《顾亭林》）。今可考见者，尚近五十种之多。《日知录》三十二卷，为其代表著述，一生为学所得，大都荟萃其中，实为开一代学术风气之力作。《音学五书》三十八卷，为炎武的另一部代表作品。清代二百六十馀年间，音韵文字学之能勃然歛起，由经学的附庸而蔚为大国，炎武建有不可磨灭的开创之功。《天下郡国利

病书》和《肇域志》，虽为炎武早年所辑，且仅系长编，尚须过细整理，然而对考论中国古代史，尤其是有明一代的经济史、社会史，以及方志、舆地诸学，皆极具价值。其他诗文杂著，诸如《顾亭林诗文集》、《明季实录》、《历代帝王宅京记》、《营平二州史事》、《金石文字记》、《左传杜解补正》，以及《菰中随笔》等，探讨学术，知人论世，在在皆可采择。

二、《日知录》纂修考

顾炎武何时开始结撰《日知录》？这是一个迄今尚无定论的问题。康熙九年，当该书以初成八卷在江苏淮安付刻时，炎武曾在卷首写有如下识语：“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顾炎武：《日知录》卷首，《题记》）由康熙九年上溯三十余年，约当明崇祯十二年。早先谈《日知录》，我曾据此将其始撰时间大致定在明末。一九九八年初，河北人民出版社约撰《旷世大儒顾炎武》，经与几位年轻学友切磋，认为仅据这篇题记来判定《日知录》的始撰时间，恐怕还缺乏足够说服力。理由如下：

首先，这里有一个认识问题需要解决，即能否把顾炎武早年读书做札记，同结撰《日知录》看成一回事。我们认为，应当把二者区别开来。的确，从少年时代开始，顾炎武就接受了读书要做札记的良好教育，用炎武的话来讲，就叫做“钞书”。炎武晚年写过一篇《钞书自序》，文中说：“先祖曰：‘著书不如钞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也，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小子勉之，惟读书而已。’”至于何时开始作读书札记，这篇《钞书自序》也有回顾：“自少为帖括之学者二十年，已而学为诗古文，以其间纂记故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馀年，读书日以益多，而后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也。”（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钞书自序》）可见，炎武虽自幼闻“钞书”庭训，而付诸实践去“纂记故事”，已经二十馀岁，直至四十岁才开始著书，五十馀岁以后，又因先前著述的不成熟而懊悔。炎武二十馀岁当明崇祯中，而四十岁则已入清，为顺治九年，五十馀岁就是康熙初叶了。

其次，顾炎武自崇祯十二年开始纂辑的书并非《日知录》，而是《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据炎武晚年所撰《天下郡国利病书序》称：“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馀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天下郡国利病书序》）崇祯己卯即十二年，炎武时年二十七岁。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肇域志序》也说得很清楚：“此书自崇祯己卯起，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之。”（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六，《肇域志序》）可见，顾炎武《钞书自序》中所说的“纂记故事”，即指崇祯十二年、二十七岁起所辑《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再次，《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卷帙浩繁，顾炎武在完成这两部书稿之前，不可能再分心去结撰《日知录》。据考，《天下郡国利病书》初稿完成，当在顺治九年。是时，由于豪绅煎迫，家难打击，炎武已萌弃家北游之想。为此，江南友人杨彝、万寿祺等，于是年初联名写了一篇《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苏州大学周可真教授著《顾炎武年谱》考之甚详，请参阅。）文中明言，《天下郡国利病书》已“手录数十帙”，之后，炎武将“游览天下山川风土，以质诸当世之大人先生”（沈岱瞻：《同志赠言》之《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至于《肇域志》的脱稿，则在此后十年，即康熙元年。是年十月，炎武撰《书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有云：“右十年前友人所赠。自此绝江逾淮……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馀卷，爰成《肇域记》。”（顾炎武：《亭林佚文辑补》不分卷，《书杨彝万寿祺等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

最后，炎武本人及友朋谈及《日知录》，皆在康熙初年以后。今本《日知录》卷首所载炎武各条文字，如《初刻日知录自序》、《与人书十》、《与人书二十五》、《与潘次耕书》、《与杨雪臣书》、《与友人论门人书》等，众所周知，恕不引述。此外可以为证者，至少尚有如下五例：第一为康熙九年山东德州程先贞撰《赠顾征君亭林序》，第二为康熙十一年炎武《与李良年书》，第三为康熙十二年炎武《又答李武曾书》，第四为康熙十二年炎武《又与颜修来书》，第五为康熙十五年炎武《与黄太冲书》。文繁，宥我不录。

根据以上所考，足见把《日知录》的始撰时间定在明崇祯十二年似欠妥当。我们以为，宜以顾炎武逝世前夕，康熙二十年《与人书》为据。炎武在此信中说：“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今为《五书》以续《三百篇》以来久绝之传，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馀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二十五》）据此，《日知录》的始撰时间，假如定在康熙元年，即炎武五十岁以后，或许会更合理一些。

在《日知录》的结撰过程中，初刻八卷本的问世，是一个重要环节。以往，由于这个本子流传未广，不易得读，所以有的研究者遂误认为已经亡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将这个本子影印，附录于《日知录集释》出版，这样不仅澄清了误会，而且大大方便了研究者。

《日知录》的初刻时间，可以大致确定为康熙九年八月。根据主要是两条，第一条为顾炎武康熙十五年所撰《初刻日知录自序》。序中说：“炎武所著《日知录》，因友人多欲钞写，患不能给，遂于上章阉茂之岁刻此八卷。”（顾炎武：《亭林文集》卷二，《初刻日知录自序》）上章阉茂为干支纪年之庚戌，即康熙九年。第二条为前述程先贞撰《赠顾征君亭林序》，该序所署年月即为康熙九年八月。有关《日知录》初刻时间的资料，还见于《蒋山佣残稿》。其中，炎武的《与友人书》说：“《日知录》初本乃辛亥年刻。”（顾炎武：《蒋山佣残稿》卷一，《与友人书》）辛亥年为康熙十年。顾炎武谈《日知录》初刻，为什么在时间上会出现庚戌、辛亥二说？我们以为，是否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即八卷本《日知录》系康熙九年始刻，而至康熙十年完成。

初刻八卷本问世之后，《日知录》的结撰不间寒暑，精益求精，耗尽了顾炎武毕生的心力。对于其间的甘苦，炎武曾经说：“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人书十》）顾炎武将《日知录》的结撰喻为采铜于山，可见其劳作的艰辛和学风的严谨。

晚年的顾炎武，恪遵“良工不示人以璞”的古训，精心雕琢《日知录》。在致弟子潘耒的信中，炎武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昔伊川先生不出《易传》，谓是身后之书。……今世之人速于成书，躁于求名，斯道也将亡矣。前介眉札来索此（指《音学五书》——引者），原一亦索此书，并欲钞《日知录》。我报以《诗》、《易》二书今夏可印，其全书再待一年，《日知录》再待十年。如不及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顾炎武没有违背自己的诺言，迄于康熙二十一年正月逝世，他始终未曾把已经完成的三十余卷《日知录》再度付刻。直到十三年之后，遗稿始由潘耒删削整理，在福建建阳刻印。

三、《日知录集释》的纂辑

清代道光间问世的《日知录集释》，是研究清初学者顾炎武所著《日知录》的一部集大成的著作。然而关于该书的纂辑故实，却少见系统深入的梳理。

《日知录》以其朴实无华的务实为学，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健实的新学风。因此，该书问世之后，在学术界迅速激起反响，一时南北学者，竞相作同调之鸣。但是自康熙中叶以后，随着清廷统治的趋于稳定，尤其是雍正、乾隆两朝文字狱的冤滥酷烈，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寄寓的学以经世思想，横遭阉割。为之后学术界所继承的，只是其朴实的考经证史方法而已。于是琐细的考证补苴，日渐成为《日知录》研究中的主流。此风自阎若璩开其端，中经李光地等朝中显贵张大其势而深入庙堂，到乾隆、嘉庆两朝达于极盛。百余年间，注者蜂起，至九十余家之多。其中，既有经学大家如惠栋、江永、顾栋高、戴震、庄存与，也有史学大家如全祖望、钱大昕、王鸣盛、赵翼、邵晋涵，还有一时文坛盟主方苞、姚鼐等。风起云涌，久传不衰，俨若专门学问。

嘉庆、道光之际，清王朝越过其鼎盛时期而步入衰世。绵延于川、楚、陕边区的白莲教大起义，直逼宫禁的北方天理教起义，西方殖民者以武力为后盾的肮脏鸦片贸易，凡此种种，内外交困，有力地摇撼着清王朝的统治大厦。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动荡时期已经来临。当此多事之秋，知识界反映最称敏感。面对深刻的社会危机，乾嘉以来风靡朝野的考据学，伴随其所附著的社会亦盛极而衰。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今文经学派，阐发《春秋》公羊学大义，倡变法以图强。道光五年（一八二五），著名思想家魏源沿

从《日知录》到《日知录集释》（代前言）

波而起，辑《清经世文编》成。以之为标志，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清初学术大师学以经世的传统，又为时代召唤到历史舞台。总结百余年来《日知录》的研究成果，恢复其淹没已久的经世思想，已成为一个时代的课题。而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人，既非一时朝廷显贵，亦非学术界名流，却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学人黄汝成。

黄汝成，字庸玉，号潜夫，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生于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卒于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汝成生在考据大师钱大昕故里，其嗣父钟即为大昕弟子，生父铉亦以善诗文而名著一方。汝成少承家学，又兄事大昕再传弟子毛岳生，颇得乡里前辈为学端绪。自十三四岁起，即已“熟习文史”（毛岳生：《休复居文集》卷五，《黄潜夫墓志铭》），二十岁以后，成为县学廪膳生。后因久困场屋，不得入仕，遂致力经史，博及天文历法、田赋河漕、职官选举、盐务钱法等。汝成所最为服膺者，则是顾炎武的《日知录》。正如他在写给当时江南著名学者李兆洛的信中所述：“自少至今，尤好顾氏《日知录》一书。”（黄汝成：《袖海楼文录》卷三，《答李先生申书》）

《日知录》之所以令黄汝成倾倒，并不在于文辞的博辩，考据的精详。在汝成看来，乃是因为“其书于经术文史、渊忽治微，以及兵刑、赋税、田亩、职官、选举、钱币、盐铁、权量、河渠、漕运，与他事物繁赜者，皆具体要”（同上），是一部“资治之书”（黄汝成：《袖海楼文录》卷二，《日知录集释序》）。因此，在毛岳生的辅导之下，汝成持之以恒，长期致力于《日知录》的董理。他以阎若璩、沈彤、杨宁、钱大昕四家校本为主要依据，博采诸家疏解，对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潘耒刻本逐卷校释，终成《日知录集释》三十二卷，于道光十四年五月刊行。书成之后，汝成又觅得《日知录》原写本，经与潘刻本详加比勘，辨其异同，正其疑似，共得七百余条，成《日知录刊误》二卷，于道光十五年二月刊行。之后，汝成再得嘉兴陆筠精校本，取与先前所纂《集释》校订，成《日知录续刊误》二卷，于道光十六年九月刊行。

黄汝成家素丰厚，不惟刻书费用概由己出，而且还捐资选授安徽泗州训导。但因其生母、嗣父相继去世，故而居丧在家，未能赴任。汝成秉性旷达，乐于周济友朋困乏，深得远近学者敬重。无奈身体过于肥胖，长期为哮喘所苦，后竟因之而遽然去世，卒年仅得三十九岁。黄汝成正当为之年而被病魔夺去生命，使他的众多生前友好至为悲恻，毛岳生、李兆洛、蒋彤、葛其仁等，纷纷撰文吊唁。其生父哀汝成赍志而歿，遂委托毛岳生主持，对其遗文杂著加以搜集整理，题名《袖海楼杂著》，于道光十八年九月结集刊行。其中包括《袖海楼文录》六卷，《古今岁实考校补》一卷，《古今朔实考校补》一卷，《日知录刊误合刻》四卷。汝成生前，在完成《日知录集释》并《刊误》之后，原拟续纂《春秋外传正义》，终因猝然病歿而成未竟之业，仅于《文录》中留下数篇札记而已。

黄汝成辑《日知录集释》，以及相继完成的《日知录刊误》、《续刊误》，荟萃前人的研究所得，既阐发了原书精义，校订了著者疏失，也纠正了潘刻本的若干舛错。同时，还一扫乾嘉考据学家的偏颇，重申了炎武经世致用的撰述宗旨，从而为《日知录》研究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善的本子。对汝成的艰苦劳作，理当充分肯定，值得纪念。然而到清末，非难

声起，竟指《日知录集释》为李兆洛纂辑，诬汝成窃李书为己有。事实果真如此否？不然。只要我们稍事搜寻，比勘史料，即可验证其间的真相。

首先，在李兆洛的现存遗著中，寻找不出任何足以说明他纂辑《日知录集释》的证据。固然，李兆洛一生正是以表彰先贤遗集，致力纂辑而著称。因此，凡由兆洛纂辑，或经他表彰刊行的前哲著述，诸如《皇朝文典》、《骈体文钞》及《邹道乡集》、《瞿忠宣集》、《绎志》、《易论》等等，皆撰有序跋、题记一类文字。然而，唯独就不见表彰《日知录》的记载。尤其不应忽视者，在一部二十六卷的《养一斋文集》及《续编》中，竟然没有一篇专门探讨顾炎武学行及《日知录》的文字。仅在《文集》卷四《顾君（广圻）墓志铭》中，偶一提及“亭林先生罗列改书之弊”寥寥数字而已。这样一种情况，恐怕同《日知录集释》纂辑者的地位是不相称的。此外，兆洛高第弟子薛子衡所撰《养一李先生行状》，文中所罗列李氏纂辑书目，也无《日知录集释》。相反，李兆洛谈及《日知录集释》，则准确无误地称其纂辑者为黄汝成。他说：“潜夫……所著书，惟成《日知录集释》三十二卷，《刊误》二卷，《袖海楼文稿》若干首。”（李兆洛：《养一斋续集》卷五，《黄潜夫家传》）

其次，在李、黄二人的友朋中，凡谈及《日知录集释》，皆众口一词，肯定其纂辑者为黄汝成。毛岳生是李、黄知交，岳生所撰《黄潜夫墓志铭》有云：“潜夫著书，成者《日知录集释》、《刊误》、《古今岁朔实考校补》、《文录》，凡四十四卷。未成者，《春秋外传正义》若干卷。”（毛岳生：《休复居文集》卷五，《黄潜夫墓志铭》）宋景昌为李兆洛高足，汝成遗稿《古今岁朔实考校补》即经景昌校订刊行。宋氏《岁朔实考校补跋》同样说：“潜夫笃志好古，博学明识如此。始潜夫既成《日知录集释》与此书，复欲撰《春秋外传正义》，未卒业遂歿。”（宋景昌：《岁朔实考校补跋》，载黄汝成《袖海楼杂著》附录）兆洛的另一高足蒋彤，为《袖海楼文集》撰序，亦说得十分清楚：“宝山毛先生数数为予言黄君潜夫之为人。……迨后，得观其所著顾氏《日知录集释》，叹其志古人之学而能先其大者。继得其《日知录刊误》及《续刊误》，尤服其大而能精，非徒因博炫富而漫无黑白者。”（蒋彤：《丹棱文钞》卷二，《袖海楼文集序》）

再次，作为《日知录集释》的纂辑者，黄汝成于《袖海楼文录》中，不仅再三重申对该书的纂辑地位，而且多载与友朋讨论《日知录》及顾炎武学行的文字，诸如《与吴淳伯书》、《答李先生申耆书》、《与毛生翁书》等。正是在与李兆洛的书札往复中，保存了兆洛对《日知录集释》的倾心推许：“评鹭考核，删削繁类，使此书得成巨观，有益世道人心，真学者之幸也。”（黄汝成：《袖海楼文录》卷三，《答李先生申耆书》）黄汝成学风笃实，凡四方友朋在《集释》成书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诸如亲朋故旧的提供度藏资料，李兆洛、吴育、毛岳生对书稿的审订，毛岳生对《刊误》、《续刊误》的校核，同邑友好王浩自始至终的“勤佐探索”（黄汝成：《袖海楼文录》卷二，《日知录刊误序》）等等，感铭不忘，屡见表彰。所有这些记载，确然有本，可信可据，显然非剽窃作伪者之所能为。

综上所述，足见《日知录集释》的纂辑者本来就是黄汝成，并不是李兆洛。李兆洛于《集释》，确有“校雠之劳”（蒋彤：《丹棱文钞》卷三，《养一子述》），而无纂辑之功，这才是历

从《日知录》到《日知录集释》（代前言）

史的真相。

近者，欣悉栾保群、吕宗力二位学弟早年之《日知录集释》点校稿，经精心审订，历有年所，行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谨删削旧文以附骥尾，既志祝贺，亦敬请诸位先进赐教。

校点说明

《日知录》无疑是顾炎武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自从顾氏中年开始把事业转向于学术，《日知录》的写作可以说伴随了他的终生。从后人根据顾氏遗稿所辑的《日知录之余》四卷可以看出，只要一息尚在，顾炎武就还要写作下去。但此书在写作过程中就已经知名于学术界，顾氏曾因友人多求钞写，患不能给，遂于康熙九年（1670年）先刻《日知录》八卷，后附《读觚十事》，是为符山堂初刻本。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顾炎武去世，其弟子潘耒从顾家求得《日知录》全部手稿，经再三校勘编辑，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刻于闽中，是为遂初堂刻本，计分三十二卷，文字多于八卷本约五倍。但潘氏震于当时文字之祸，不得不对原稿“违碍”之处加以润改，“所刊落有全章，有全节，有数行，自余删句换字，不可遽数”（黄侃《日知录校记序》）。潘氏为先生入室弟子，深明先生学术，由他来删改，既能免遭禁焚之祸，又能最大程度地保存先生学术思想，所以潘氏的功劳自不可没。

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又有据遂初堂重刊本，末附《日知录之余》。另外还有乾隆时巾箱本、皇清经解本。这些在版本上没有什么重要价值。

至道光间，青年学者黄汝成，以遂初堂为底本，参以阎若璩、沈彤、钱大昕、杨宁四家校本，成《日知录集释》三十二卷。复得《日知录》原写本，并参以陈吁（即宋斋陈氏）、张惟赤（南曲张氏）、蘧园孙氏（名佚）、楷庵杨氏（名佚）等校语，成《日知录刊误》二卷。后又得陆筠（匏尊陆氏）校本，作《续刊误》二卷。虽然黄氏见到了“原写本”，也不敢把其中的“违碍文字”补改遂初堂本，但毫无疑问，他所刻西溪草庐本给世人提供了《日知录》的最精善之本。而且对《日知录》的考辨引申，自阎若璩以来，至乾嘉时已成专门之学。黄汝成的《集释》为此收录了道光以前九十馀位学者对《日知录》的研究成果，这就更使他成为潘耒之后整理《日知录》的第二功臣。至民国时，黄侃从张继手中得到雍正间《日知录》钞本，虽然此钞本不是顾氏的原稿，而且钞写拙陋，但总算保留了大量原本的文字。于是黄侃据以对校黄氏《日知录集释》，成《日知录校记》一卷，终于使《日知录》的版本在《集释》之后得到新的突破。

下面我们对校补工作作一些说明：

一，在版本上，《日知录集释》自然以道光十四年嘉定黄氏西溪草庐本为最善，但此本刷出后，黄汝成又详加审校，在撰写《续刊误》的同时，对原刻做了修正。至晚在道光十八年，即黄汝成去世之后的二年，西溪草庐对《集释》原版进行剜改，再次印刷，这才是《日知录集释》的最精善之本。而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影印的即是此本，我们即以其为点校底本，在校记中我们简称“原本”。但西溪草庐本也间有舛讹，我们就

校点说明

根据引文出处对校,对发现的错字予以改正。然后再用黄侃《日知录校记》(略称“校记”)的成果补改黄本,补改之字径直出为正文,以体现《日知录》的原貌,而为避免烦琐,对那些因避明朝国讳的校语(如明光宗朱常洛,钞本于“洛”字下即注“讳阙”二字)一律不取。这样就补正数百处,增入数千字,力求成为至今为止最完整最接近顾氏原貌的一个本子。

二,顾氏原书大量引用前人著述,并参以己见,一篇之内,相互间杂,如不加上引号,读者就很难分辨是引文还是顾氏自己的论述(博学如赵翼,都难免发生此类误读)。所以为了方便读者阅读,引文的引号是必须要加上的。但顾氏的引文并不都是原书照钞,很多都是对原著的臚括及节略。另外就是顾氏强记,一时无两,而他长年旅居的特殊写作条件也就让他在很大程度上要凭借记忆写作。于是这就难免在引用典籍时不但出现一些误记,字句的出入也时有发生。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也只好都加上引号。而只要引文与原文在意思上无出入,即不作校改。有必须校改处,即以圆括号和方括号标识,不另出校语。

三,顾氏引文多自注出处,但由于成书的特殊情况,顾氏或因一时难于查明出处,或因“四书五经”为时人所熟稔,无须出注,故仍有大量引文未注出处。今即循顾氏之例,也为了方便读者,我们尽量把出处补齐。而顾氏所注出处也间有错误,我们也据引文查出改正。

四,《集释》所引九十馀家著作,凡能找到原书者,即据原书校勘,但引文也多有节略,故只要与原意不差,即不改动,而有些找不到原著者,对其明显错误也作了校改。《集释》及附录中避清讳字径改,不出校。

五,李遇孙继閻若璩之后作《日知录续补正》(略称“续补正”),丁晏又有《日知录校正》(略称“校正”),俞樾有《日知录小笺》(略称“小笺”),俱为黄汝成所不及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曾于一九八五年附于所影印的《日知录集释》之后,今择其精要,编入《日知录》各条之下,并排以楷体字,以区别于原注。而黄汝成的《刊误》、《续刊误》在版本辨证上自有其价值,但因其成果已经体现在西溪草庐本中,我们就不再采录。

由于我们学殖浅薄,加上一些《集释》所引书籍不易查找,书中自然会出现一些错误,敬请诸方读者多加指正。

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田松青先生为审阅此书付出了很辛勤的劳动,而且提出不少建设性意见,并指正多处错误,我们不胜感激。另外,我们采用了侯体健同志整理校补的《日知录之余》作为本书的附录,也一并在此表示感谢。

栾保群 吕宗力
二〇〇五年十月

《日知录集释》总目

从《日知录》到《日知录集释》（代前言） / 1

校点说明 / 1

黄汝成叙 / 1

潘耒原序 / 6

先生初刻《日知录》自序 / 7

《日知录集释》正文三十二卷 / 1

附录一 谪觚十事 / 731

附录二 日知录之余 / 739

黄汝成叙

叙曰：自明体达用之学不修，僞生巨材，日事纂述，而鸿通瑰异之资，遂率隳败于词章训诂、襞绩破碎之中。汉时经术修明，贤哲著书，大都采择传记百家，论说时政与己志而已。魏、晋以降，著录始广。唐以后，遂歧分为数家。其善者，自典章、经制、文物、度数以及佛老之书，微裔之迹，莫不明其因革损益、巨细本末，号称繁博。然求其坐而言可起而行，修诸身心，达于政事者，不数觐焉。昆山顾亭林先生，质敏而学勤，淳醇而节峻，出处贞亮，固已合于大贤。虽遭明末丧乱，迁徙流离，而撰述不废，先后成书二百餘卷，闳廓奥赜，咸取体要，而智力尤瘁者，此也。其言经史之微文大义、良法善政，务推礼乐德刑之本，以达质文否泰之迁嬗，错综其理，会通其旨。至于赋税、田亩、职官、选举、钱币、权量、水利、河渠、漕运、盐铁、人材、军旅，凡关家国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变之道，词尤切至明白。其余考辨，亦极赅洽。《易》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又曰：“《困》者，德之辨也。”《传》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岂非善成其鸿通瑰异之资，而毕出于体用焉哉！元、明诸儒，其流失喜空言心性，凡讲说经世之事者，则又迂执寡要。先生因时立言，颇综核名实，意虽救偏，而议极峻正，直俟诸百世不惑，而使天下晓然于儒术之果可尊信者也。汝成钻挈是书，屡易寒暑，又得潘检讨删饰元本，阎征君、沈鸿博、钱官詹、杨大令四家校本。先生讨论既伙，不能无少少渗漏。四家引申辩证，亦得失互见，然实为是书羽翼也，用博采诸家疏说传注名物、古制、时务者，条比其下。伏处海滨，见闻孤陋，又耆硕著书富邃而义无可附，则亦阙诸，窃虑踳驳，有逾简略。呜呼，学识远不逮先生毛发，而欲以微埃涓流上益海岱之崇深，抑愚且妄矣！然先生之体用具在，学者循其唐涂，以窥贤圣制作之精，则区区私淑之心，识小之指，或不重为世所诟病者矣。书凡三十二卷，篇帙次第略不改易。《集释》条目诸贤名氏里爵，具列于后，而辄著其大指于篇。

先生著述闳通，是书理道尤博，学术政治，皆综隆替，视彼窳言，奚啻瓶智。自康熙三十四年，吴江潘检讨刻于閩中，流行既久，刊劂多讹。潜丘诸君，皆有斟正，今兹《集释》，即缘为权舆。复广加钩析，脱字既增，误文亦削。诸君别著，论纂虽殊，指意可并，则亦附诸。至先生所纂《金石文字记》、《山东考古录》、《石经考》、《五经同异》、《音学五书》、《郡国利病书》、《亭林诗文集》、《菰中随笔》等书，凡藉参稽，亟为决择，若异径庭，不引诂训。至汉、唐及明，经史传纪、诸子杂家，皆先生博综穿穴，兹更无事骈枝，凡所称引，率断自先生同时及后贤所述。

先生问学浩博，论说深远，专综大纲，或忘识小。诸家辨驳，其无关宏旨者勿论，间有异同，转滋歧舛，用援郑诂《礼经》、颜注《汉史》之例，拾遗元文，参以私测，更列众

黄汝成叙

叙曰：自明体达用之学不修，儒生巨材，日事纂述，而鸿通瑰异之资，遂率隳败于词章训诂、襞绩破碎之中。汉时经术修明，贤哲著书，大都采择传记百家，论说时政与己志而已。魏、晋以降，著录始广。唐以后，遂歧分为数家。其善者，自典章、经制、文物、度数以及佛老之书，徽裔之迹，莫不明其因革损益、巨细本末，号称繁博。然求其坐而言可起而行，修诸身心，达于政事者，不数觐焉。昆山顾亭林先生，质敏而学勤，谊醇而节峻，出处贞亮，固已合于大贤。虽遭明末丧乱，迁徙流离，而撰述不废，先后成书二百馀卷，闾廓奥蹟，咸职体要，而智力尤瘁者，此也。其言经史之微文大义、良法善政，务推礼乐德刑之本，以达质文否泰之迁嬗，错综其理，会通其旨。至于赋税、田亩、职官、选举、钱币、权量、水利、河渠、漕运、盐铁、人材、军旅，凡关家国之制，皆洞悉其所由盛衰利弊，而慨然著其化裁通变之道，词尤切至明白。其余考辨，亦极赅洽。《易》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又曰：“《困》者，德之辨也。”《传》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岂非善成其鸿通瑰异之资，而毕出于体用焉哉！元、明诸儒，其流失喜空言心性，凡讲说经世之事者，则又迁执寡要。先生因时立言，颇综核名实，意虽救偏，而议极峻正，直俟诸百世不惑，而使天下晓然于儒术之果可尊信者也。汝成钻瑩是书，屡易寒暑，又得潘检讨删饰元本，闾征君、沈鸿博、钱宫詹、杨大令四家校本。先生讨论既伙，不能无少渗漏。四家引申辩证，亦得失互见，然实为是书羽翼也，用博采诸家疏说传注名物、古制、时务者，条比其下。伏处海滨，见闻孤陋，又耆硕著书富邃而义无可附，则亦阙诸，窃虑踳驳，有逾简略。呜呼，学识远不逮先生毛发，而欲以微埃涓流上益海岱之崇深，抑愚且妄矣！然先生之体用具在，学者循其唐涂，以窥贤圣制作之精，则区区私淑之心，识小之愆，或不重为世所诟病者矣。书凡三十二卷，篇帙次第略不改易。《集释》条目诸贤名氏里爵，具列于后，而辄著其大指于篇。

先生著述闾通，是书理道尤博，学术政治，皆综隆替，视彼窺言，奚啻瓶智。自康熙三十四年，吴江潘检讨刻于闽中，流行既久，刊刷多讹。潜丘诸君，皆有斟正，今兹《集释》，即缘为权輿。复广加钩析，脱字既增，误文亦削。诸君别著，论纂虽殊，指意可并，则亦附诸。至先生所纂《金石文字记》、《山东考古录》、《石经考》、《五经同异》、《音学五书》、《郡国利病书》、《亭林诗文集》、《菰中随笔》等书，凡藉参稽，亟为决择，若异径庭，不引谄训。至汉、唐及明，经史传纪、诸子杂家，皆先生博综穿穴，兹更无事骈枝，凡所称引，率断自先生同时及后贤所述。

先生问学浩博，论说深远，专综大纲，或忘识小。诸家辨驳，其无关宏旨者勿论，间有异同，转滋歧舛，用援郑诂《礼经》、颜注《汉史》之例，拾遗元文，参以私测，更列众

储大令方庆，字广期，宜兴人。进士。
 严太仆虞惇，字宝成，常熟人。进士。
 姜氏宸英，字西溟，慈溪人。官编修。
 方侍郎苞，字灵皋，桐城人。进士。
 惠侍读士奇，字天牧，吴县人。进士。
 任氏源祥，字王谷，宜兴人。
 王给事命岳，字伯咨，晋江人。
 陈氏启源，字长发，吴江人。
 梅氏文鼎，字定九，宣城人。
 臧氏琳，字玉林，武进人。
 丘氏嘉穗，字秀瑞，举人，浙江人。
 陈庶子迂鹤，字介石，安溪人。
 杨编修绳武，字文叔，吴县人。
 顾司业栋高，字复初，无锡人。
 陈文恭宏谋，字汝咨，临桂人。官大学士。
 陈总兵伦炯，字资斋，同安人。
 曹给事一士，字谔庭，上海人。进士。
 汪氏师韩，字抒怀，钱塘人。官编修。
 柴氏绍炳，字虎臣，仁和人。
 谢中丞敏，字肃斋，武进人。
 陈通政兆仑，字句山，钱塘人。乾隆初举博学鸿词。庶吉士。
 全氏祖望，字绍衣，鄞县人。乾隆初举博学鸿词。
 陈鸿博黄中，字和叔，吴县人。乾隆初举。
 徐鸿博文靖，字位山，当涂人。乾隆初举。
 乔氏光烈，字敬亭，上海人。进士。官巡抚。
 裘文达曰修，字叔度，新建人。进士。官尚书。
 官氏献瑶，字瑜卿，安溪人。官洗马。
 王方伯太岳，字芥子，定兴人。进士。
 姚氏范，字南青，桐城人。官编修。
 江氏永，字慎修，婺源人。
 卢氏文弨，字绍弓，余姚人。侍讲学士。
 陆中丞燿，字青来，吴江人。举人。
 庄侍郎存与，字方耕，武进人。进士及第。
 王氏鸣盛，字凤喈，嘉定人。光禄寺卿，进士及第。
 黄氏中坚，字震生，吴县人。